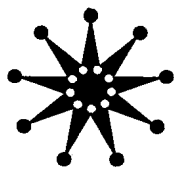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名家论丛

西方社会主义  
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张玉法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名家论丛

西方社会主义  
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张玉法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张玉法自选集/张玉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名家论丛)

ISBN 978 - 7 - 5161 - 0180 - 3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社会主义—影响—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K257.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4211 号

责任编辑 萧 莲  
责任校对 刘 俊  
装帧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木 子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a href="http://www.csspw.cn">http://www.csspw.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7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原广东社会科学院张磊院长与朋友们策划出版一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丛书，承约提供与孙中山革命有关的论文集书稿一部，至感荣幸。个人从事现代史研究之始，即以辛亥革命为研究范围，先后出版过三本书，即《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的革命团体》和《民国初年的政党》。这三本书在台湾出版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且已绝版。近年由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热络，《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已于2007年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简体字版，《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的革命团体》二书也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读者当不难读到。

在研究辛亥革命期间及以后，除出版专书外，也陆续发表过不少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学术论文。1990年应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之约将这一方面的部分论文结集成《辛亥革命史论》出版，兹再以孙中山为中心，结集与孙中山革命有关的论文，应丛书主编的要求，题名《张玉法自选集》。对孙中山来说，在他有生之年，革命尚未成功，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他革命事业的第一阶段，其后的革命可以说都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基于此考虑，本书选文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虽以辛亥革命前后为重心，但下限到1924年自广州北伐为止。

本书所选的论文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学术期刊论文，包括《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和《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对抗（1912—1914）》；第二类为学术会议论文，包括《孙中山在夏威夷》、《革反与革进并行：论孙中山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知识青年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反应》和《台湾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第三类为最近完成的两篇论文，一系依据作者于197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撰的硕士论文翻译改写而成，题名《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一系依据一篇学术会议论文重新改写而成，题名《孙中山与

1924年的北伐》。除两篇最近完成的论文外，均已正式发表。所以如此选文，又增加两篇未曾正式发表的论文，目的在呈现孙中山的革命有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而思想的指导比实际的作为更有成就。

本书除论文外，应主编的要求，收入学术自传一篇和著作目录一种，学术自传题名《治史回忆》。当此国内外普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作为历史研究者只能在历史见证方面略尽绵薄，请读者指正。

张 玉 法  
2011年3月  
台北

# 目 录

自序 .....	(1)
治史回忆 .....	(1)
孙中山在夏威夷 .....	(9)
革反与革进并行:论孙中山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 .....	(27)
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51)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	(112)
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 .....	(126)
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对抗(1912—1914) .....	(213)
知识青年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反应 .....	(280)
孙中山与1924年的北伐 .....	(300)
台湾地区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1950—2000) .....	(324)
附录	
主要学术著述目录 .....	(339)
征引书目 .....	(350)

## 治史回忆

1955年我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修课之暇协助一位教授编写中华战史，曾以新旧唐书、明史、通鉴等书的资料写过十几万字的唐朝对外战史和郑成功复国战史。当时虽然是想赚点助学金，却培养出治史的兴趣。1961年考入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曾以《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为题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当时虽然是为了学位的需要不得不写，但也是因为对治史有兴趣。1964年进入中研院近代研究所工作以后，看到许多同仁读书时在卡片上做摘要，调借档案来读，也在卡片上做摘要；常常发表论文，有时也出版专书。见贤思齐，每于公暇，读所里出版的论文和专书。我进入近代研究所初时的工作是编档案、做口述历史。大概在一年以后，所长郭廷以先生说：“你可以做点研究工作了。现在的同仁大都做19世纪，你最好研究20世纪。”研究20世纪？有什么题目可以做呢？郭先生并没有指示，要我自己想一想。记得在读研究所时，我想做20世纪中国的传播史，指导教授不鼓励我做，说动辄得咎；我才在古史中找题目。现在进入近史所，不能做古代史了，想来想去想到一个题目，就是研究“民国初年的政党”。

为什么选择民国初年的政党？大概是起于幼年时的心灵创伤。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兵荒马乱，好不容易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与共产党又全面开战；我的家乡鲁南，受这方面的影响甚深。1948年我在国民党统治下读小学五年级，听说共产党要来了，县立中学准备要南迁。父亲是个小地主，就叫我以同等学力考县中，跟着学校南下。我随着县中，一直跟着撤退的国民党走，共产党在后面追，一直到1949年7月学校自广州渡海到台湾，才安顿下来。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毕业读研究所，研究所毕业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所长郭先生要我研究20世纪，

研究什么？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党”。但不敢研究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因为不容易看到资料，而且禁忌甚多。初步阅读资料，知道中国正式有政党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事，追根溯源，是从民国初年的政党研究起。近史所的研究工作是自由的，选什么题，怎样研究，都没有人干涉，只要有研究成绩就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发现民国初年的重要政党，都是由晚清的改革派和革命派演变而来的，革命派演变为国民党，由孙中山领导；改革派（即立宪派）演变为进步党，主要由梁启超领导。研究这两大派系，便进入辛亥革命的范围，但我仍然以政党史的角度切入，先研究“清季的立宪团体”，再研究“清季的革命团体”，之后才研究“民国初年的政党”。

长期计划研究这三个题目是我个人的兴趣，也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近史所新成立，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外，没有什么特殊材料。台湾地区的史料典藏机构都很封闭，要找到有力人士介绍，才能略窥一二。所内一些年资较深的同仁，大都就整理和编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之便，研究外交史和洋务运动史。郭所长为了掌握台湾地区所收藏的近代史资料，分派同仁到各大图书馆调查，并抄写目录，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依据我个人调查的经验，有关20世纪的一些珍贵书刊，图书卡片上有，实际上找不到；图书管理人员当场在图书卡片上盖上“遗失”图章。在调查近代史书目的过程中，美国有十几所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成的大学，或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大学，想了解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典藏的资料，各出资500美元，委托近史所派人前往调查，要求做出目录，并且说明该项史料的内容大要。郭所长与党史会主任委员罗家伦先生的关系良好，事情很快谈妥。郭所长要我和另一位年轻同仁严锦先生做这件工作。

当时党史会的资料库在南投县草屯镇，我们在史料库附近租房子，在那里住了半年。每天按时上下班，前往史料库抄录史料目录、写史料摘要。写史料摘要需要调出原档阅读，当时掌管史料库的是后来以研究新疆史著名的张大军先生，每调到比较珍贵的史料，大军先生就说：“这是宝贝，不能给你看！我们来台湾，家当都丢了，好不容易运来这些史料，不能随便给人看的。前些年吴相湘带着研究生来抄走许多史料，现在成为名学者了。”不过，在大军先生看来，辛亥革命时期的资料不算珍贵，所以我想调阅的史料，大部分都给我调了。凡与我上述三个研究专题有关的史



料，我尽量调、尽量抄，收获良多。那时我正在写《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因为掌握到党史会所藏的报刊和档案，很快就有了眉目。史料调查结束后，我把《清季的立宪团体》书稿写完，拿给郭所长看。不久他说可以出版，真是喜出望外。那时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亚洲地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并协助训练这方面的人才。近史所的同仁已有1/2以上先后前往英、日、美等国进修，有些并攻读学位。此一研究人才训练计划快要结束了，还有两三个名额，侥幸获选，即于1968年10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进修。因为资助金只够在美国生活一年零九个月，我进入硕士班，并以《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为题，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我为了修改《清季的立宪团体》书稿，并进一步研究《清季的革命团体》和《民国初年的政党》，除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搜集资料外，还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芝加哥、史丹佛、加州等大学搜集资料。带回台湾的史料抄件和复印件，装起箱来，比衣服还多。当时觉得几年也享用不尽。

1970年夏天回到近史所，将《清季的立宪团体》出版，即开始撰写《清季的革命团体》。因为资料已经掌握，撰写进度顺利，到1975年即获得出版。之后即从事《民国初年的政党》的撰写工作。其间《清季的革命团体》出版，遇到一些挫折。当时郭所长已离职，所长王聿均先生为人谨慎，对书稿中的一些用词不同意，我稍作调整以后，还是出版了。与该书出版的同时，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则被搁置，朋园先生不得已，后来拿到民间的出版社出版。当时近史所的升等制度是每升一等需出版一本专书，同仁出版的专书很多，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几乎每一本书都有人写书评。近史所出版的专书，各书评价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的史料多，对史料的解释少。有一次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来近史所访问，与同仁聊天，半开玩笑地说：哈佛大学有史料有理论，近史所有史料无理论，某某大学既无史料也无理论。费先生对近史所的批评是对的，郭所长治学，一向依据史料建构史实，从来不谈什么理论。当时近史所同仁大多是郭先生的学生，到近史所以后大都以整编外交档案作为入手研究之门。做研究的时候，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对不做超出史料的归纳和演绎，既不依据什么理论作为研究的指针，也不会创造出什么理论。

中研院的许多研究计划是受国科会资助的，国科会掌管人文的部门有

不少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喜欢理论，有一次就直接派人到近史所找同仁来谈，说近年研究开发中国家都用现代化的理论，问我们能不能找一批同仁，以现代化的理论来检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国科会的建议说动了一批同仁，于是就由李国祁、张朋园两位先生组织“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院校际十人研究计划，分别研究沿江沿海的十个省区的近代化发展。当时同仁对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有不同的意见，因李国祁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课，就使用了“近代化”一词。主持人在找人参与研究计划时，李国祁找到我，我当时正研究民国初年的政党，实在不愿参加，但李国祁先生说我是山东人，山东省没有人研究（吕实强是山东人，选择研究四川；其他山东籍的同仁各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我虽是山东人，但从没有想到要研究山东，既而想想，当初发宏愿要写的三部曲已写得差不多，下一步的研究课题还不知怎么选择。继续研究政党史，在政治高度敏感下，似无可能；国科会的计划说要用新理论、新方法，不如姑且一试，就答应研究1860—1916年的山东近代化发展，原计划进行三年。到三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负责审查本计划研究成果的海外学者刘广京先生表达意见，说分省做近代化研究，写得太细，外国学者读起来很吃力，引不起兴趣，不如改做全国性的近代化问题。于是第三年结束后，就组织了一个新计划，叫“中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为期两年，仍是十人参加。当时我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开“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课，推我为主持人，我就把“近代化”改为“现代化”。在这个计划中，我研究工业化，两年计划结束后，又延长半年。以“近代化”或“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近代史五年半，国科会每年催稿，实在太辛苦，于是决定停止做研究计划，开始修改研究报告。区域近代化的研究，近史所出版了闽浙台、江苏、湖北、山东等省；现代化的专题研究，近史所一本书也没有出版，作为计划主持人，我只好将稿子整理出来，交由民间书局出版，题名《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

在研究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期间，因为研究的范围包括西力冲击、传统因素，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动，对历史各方面的了解多了，研究的兴趣也广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以及海峡两岸的学术会议增多，我常常因会议主题而写论文。大部分论文，仍本近史所的固有学风，搜集史料，辨别并分析史料，建构史实；也有少部分论文，受研究现代化计划的影响，借用了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谈到借用社

会科学家的理论，我与一些同仁都有一段吸收和转化的过程。我们在做区域现代化研究计划的时候，初时有些同仁很着迷社会科学家的理论，除了自己试着借用以外，还想与社会科学家合作研究历史。有些社会科学家姿态很高，要我们依照他们的需要找材料，找来的材料由他们处理。他们说只要算出数字，或归纳出一些概念即可，史料不必堆进去；他们说，很多历史人物，忙了一生，什么具体的成就也没有，可以不写。我对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第一，历史学是独立的学科，不是社会科学的附庸；不能让史学家当社会科学家的助理。第二，任何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或任何历史演变，其过程本身即有价值 and 意义，不能只看结果。第三，社会科学家的治学方法是两点之间画一直线，历史学家常常发现两点之间是曲线；只看直线不能了解问题，看曲线才能了解问题。最后，我们没有做社会科学家的助理，仍然本着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审慎使用，对借用理论所写的书，也审慎了解它的限度。

在我看来，以任何理论来研究历史，都只能看出历史的一个面向，绝对看不出历史的全面。譬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邓嗣禹，利用心理学中刺激、反应的理论，认为“西力冲击、中国反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模式，写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与这一理论相似的，就是我们在进行中国现代化研究计划时所借用的现代化理论，此一理论认为先现代化国家是落后国家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典范，落后国家的历史道路是跟着先现代化国家走，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多元化。在借用现代化理论稍后，我也发现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社会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的一切变动，都是随最初变动的原动力所作的连锁反应。我于20世纪50年代在大学修习“史学方法”的时候，老师就要我们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在大学兼课，也劝学生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刚好近史所进行区域现代化研究计划，自己就身体力行。

我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历史，主要有三种著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和《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两本专书是用现代化的理论写出来的，《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论文是用社会均衡的理论写出来的。两本专书，内容复杂，此处不作介绍；此处仅简单介绍这篇论文的内容。在这篇论文里，我依据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经验，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定为工业化，就是利用新机器、新动力从事工业生产，

以取代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引用新机器、新动力从事工业生产，需要工商业者投资、需要科技知识和管理人才，只读儒家经典所考取的举人、进士，已不能适应社会的新需要，于是重视商人、兴办新教育以培养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而商人、工程师、新知识分子也取代了旧有的举人、进士，成为社会的新贵。工商业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随社会需要编制日益扩大的各级政府所在地也以城市为中心，于是原居于广大农村的农民子弟，为了就学、就业，大量迁居于城市，这种情形在长江下游，即京、沪、杭地区，最为明显。新一代的人口，为了就学、就业走四方，不再守着父母所传承下来的有限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庭制度（以五代同堂为理想）不能维持，小家庭日多。这些都是工业化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如果能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就会变成工业社会。可惜的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全国的人力、物力大都花在战争上，工业发展不仅迟缓，有些时期甚至衰退，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未完成。在台湾，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转型完成；在中国大陆，进入21世纪，沿海沿江地区才有工商社会的雏形。但是否如此，还有待历史学家进一步验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大社会转型的趋势，工业社会内部也不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转型；人口素质的改变、商业形态的改变、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改变，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都是工业社会内部的改变。因此，19世纪的工业社会与21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不一样的。这有待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来研究。

以工业化作为社会转型的动力来研究历史，只能看到受工业化影响所产生的历史面向；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原动力来看历史发展的面向。譬如以政治变动作为社会转型的原动力，这个面向虽然很古老，但对研究民国社会转型却非常有帮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很清楚，皇帝和士绅执政下的晚清社会，与军人和政客执政下的民初社会是不一样的，到国民党执政时期，社会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一再强调，政治史不可能不重要。政治变动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什么？史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黄铭明曾研究《北伐前后上海的工人运动（1925—1928）》、张玉法曾研究《政权转移与青岛工业发展（1898—1928）》、魏宏运曾研究《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又譬如，以文化思想变动作为社会转型的原动力，对民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也有帮助。可以作为社会转型的文化思想，最重要的是20世纪10—20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和20世纪10—4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些运动本身，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很少有人作有系统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历史的动力是多元的。从任何一个动力作为原动力来研究历史，都只能看到历史的一个面向。中国近代史学界，在以前，以一个面向看历史已经看得太多，我们还有许多面向有待开拓。

近二十余年来，我研究的历史课题很杂，有许多想研究的还没有研究；现在再回到辛亥革命的研究主题。我个人的研究工作由研究辛亥革命开始，由于对辛亥革命的议题了解较多，知道有些什么史料可以运用，别人写过什么，所以平日写学术期刊论文或学术会议论文，常在辛亥革命的范围选题目。不管写论文还是写专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辛亥革命提出什么特殊观点。1982年4月，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开年会，在美国圣路易密苏里大学任教的谢文荪先生在事先年会中安排了一场讨论会，邀请两岸学者讨论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问题。

这个讨论组共有十个人，台湾与大陆各有五位学者参加。我因为研究辛亥革命，受邀参加。我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读了大陆学者不少书，当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据说这是官方定调的，但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找不到这一方面的有力论据，于是以“全民革命”的观点，写了一篇论文，提交给亚洲年会。我的基本看法是孙中山是为全民的利益而革命，绝对不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革命，想不到在开会的时候，章开沅先生在论文中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在会场上辩论起来。因为那一次是两岸近代史学者第一次在一起讨论问题，来听讲的人很多，把整个大厅挤得满满的，约有四五百人，媒体的记者也来了很多。记得在辩论的时候，我与章开沅先生各述各的观点与论据，邹谠先生为章先生助阵，说“全民革命”说不合逻辑，全民都去革命了，那要革谁的命。我说：“邹先生没看我的文章，也未听我的论文报告，才有这样的怀疑，我的论文绝对没有写‘全中国的人都去革命’。”会议结束后，海外的中文报纸和台湾的中文报纸，都有大篇幅的报道，亲台湾的报纸和亲大陆的报纸都宣称自己胜利，把一个学术会议搞成这个样子，想来真是好笑。

由于芝加哥之会引起台湾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关注，近史所所长吕实强先生决定在当年十月举行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这是台湾史学界第一次以辛亥革命为主题开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专论“辛亥革命的性

质与意义”，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还有一位史学界的朋友说：“把辛亥革命的各种史实写出来就好，发表这种空论性的文章有何意义？”在这次会议之前，台湾不曾以学术的形式纪念辛亥革命，但报刊上的宣传是有的。记得在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时，我适好主编一个刊物，曾以社论的方式发表一篇《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纪念词》，同时搜集材料，编印一本《晚清革命文学》，作为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纪念。到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时，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已开始，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一篇文章，后来因事未能参加，论文请刘凤翰先生代为宣读，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华中师范大学再度举行学术研讨会，各地前来开会的学者都向大会表示，希望能来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学术研讨会，看来梦想成真。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国民党在台湾刚失去政权，为了提振士气，国民党党史会在圆山饭店召开一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前来参加者不少，与台湾学者相谈甚欢，往来热络。想起1982年的芝加哥之会，两岸学者只能在会场宣读论文、讨论问题，散会之后不能再会面，在路上碰到也不能打招呼，时间真能改变一切。那些年为了开会，写了不少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论文，加上我专门研究辛亥革命期间所发表的一些散篇论文，到1998年，集结成一本书，题名《辛亥革命史论》，这是我研究辛亥革命的第四本书。

当此全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媒体制作节目，史政机关办史迹展览，社会团体举行系列演讲，学术机构和大学举行学术研讨会，出版界编印丛书，证明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革命，个人在从事研究近代史之始，即投入辛亥革命的研究，深感荣幸。大革命与现代化是我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个主要范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对前此治史经验作一检讨，饶富意义。承原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先生之约，选一些个人所撰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关的论文，结集成一本书，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献礼。在此特别感谢张磊院长的安排。

# 孙中山在夏威夷

## 一 前言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12日，逝于1925年3月12日，实际在世时间为58年8个月。第一次去夏威夷在1879年6月，时年14岁；最后一次离开夏威夷在1910年5月30日，时年45岁。在14岁至45岁的31年中有六次来往于夏威夷，第一次在1879年6月至1883年7月，共约四年，主要目的是在乃兄孙眉所开的商店中帮忙，先后并入中学及大学预科读书。此行孙眉曾赠与部分财产。第二次在1885年11月至1886年4月，共约五个月，主要因染习基督教，在乡毁像读神，不见容于乡里，乃兄孙眉驰函召之，加以申斥，并索回前所赠之财产。第三次在1894年10月至1895年1月，共约三个月，主要目的在号召戚友，组织兴中会，结合同志谋革命。第四次在1895年11月至1896年6月，共约七个月，主要目的在1895年10月的广州之役失败后，继续宣传革命，并发展革命组织。第五次在1903年10月5日至1904年3月31日，共约六个月，主要活动是与保皇会论战，并加入洪门组织，俾便联络革命。第六次在1910年3月28日至5月30日，共约两个月，主要活动是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sup>①</sup> 总计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时间将近六年。

本文使用夏威夷一词指夏威夷群岛，与孙中山有关者，主要有奥湖（Oahu）、茂宜（Maui）、夏威夷（Hawaii）三岛，以及奥湖岛上的檀香山埠（Honolulu）和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Hilo）。

---

<sup>①</sup> 有关资料，散见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8年）一书，唯第五次离夏威夷的时间有误，已做更正。

孙中山何以与夏威夷有如此多关联？这些关联对他的求学和革命有何帮助？都是本文所欲探讨的。下面除结论外，即分三部分加以论述：（一）舞台：夏威夷的历史与社会，（二）在夏威夷的求学历程，（三）在夏威夷的革命活动。

## 二 舞台：夏威夷的历史与社会

夏威夷是亚洲和美洲之间的一个群岛，其地原始居民，据传在西元5世纪前后及西元11—15世纪前后由其西南诸岛（包括纽西兰）移来，属于玻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16世纪时西班牙航海家盖旦诺（Juan Gaetano）曾至夏威夷；18世纪时英国航海家柯克（James Cook）曾至夏威夷，并死在夏威夷。<sup>①</sup>19世纪时英、美、法、俄等国在夏威夷均有势力。有很长一段时间，夏威夷诸岛分立，各有酋长。1795年，土酋嘉美哈美哈（Kamehameha, 1736—1819）统一诸岛（Kauai岛则至1810年始被征服），建立王朝。此后夏威夷即由王室统治，唯因人民受当时世界思潮影响，倾心于民主。夏威夷从1840年在嘉美哈美哈三世时，在美人利卡兹（W. Richards）协助下，就开始实行宪法之治，成立议会，对王权加以限制。1842年获得美国承认，次年英、法两国亦承认之。1852年，嘉美哈美哈三世更采用新宪法，进一步限制王权，并成立两院制的国会，上院议员30人由国王指派，下院议员24人由人民选举。嘉美哈美哈王朝历五世而绝，1873年1月议会选举伦那里罗（William C. Lunalilo）继承王统，在位一年而逝，至1874年1月岛民选举嘉拉高（David Kalakaua）继承王位。<sup>②</sup>嘉拉高继承王位后的第五年（1879），孙中山去夏威夷求学，滞留至嘉拉高继承王位后的第九年（1882）。其后，孙中山在嘉拉高继承王位后的第11年（1885），受乃兄之召，再至夏威夷，滞留至次年（1886）。

嘉拉高国王较为专权，又为民族主义者，颇引起人民及外侨不满。1887年革命势力兴起，人民所争者为民权，但美国官商势力乘机操纵，

<sup>①</sup> Nancy Webb and Jean Francis Webb, *The Hawaiian Islands: From Monarchy to Democracy* (New York, 1958), pp. 3—9.

<sup>②</sup> *Ibid.*, pp. 17—102, 248.



嘉拉高被迫修改宪法，废除王室特权，规定上议院议员由人民选举，予居留夏威夷的外国人以选举权，并规定选举权受财产限制。到1891年，其妹黎里阿嘉兰尼（Liliuokalani）即位后，又倾向专政，人民再起争权，美国势力再乘机控制。1893年临时政府成立，初要求与美国合并，继则于1894年7月4日宣布成立夏威夷共和国，以杜尔（Sanford B. Dole）为总统。<sup>①</sup>夏威夷要求与美国合并不成，又选定美国独立118年纪念日成立共和国，其倾心于美国的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夏威夷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三个月，孙中山至夏威夷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兴中会誓词中的“建立合众政府”，实际上也是想仿照美国的政治制度。

各国在夏威夷的势力，原以英国最盛。自英国航海家柯克至夏威夷后，英国传教士、商人陆续到达夏威夷者颇多。1795年统一夏威夷的嘉美哈美哈一世，即以英人约翰杨（John Young）为夏威夷岛总督。约翰杨的孙女后来嫁给嘉美哈美哈第五，成为夏威夷国王的王后。但美国在夏威夷的势力后来居上，自1819年美国的基督教组合教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又译公理所、纲纪慎教会）传教士到夏威夷后，美国的传教士、渔民、商人踵至，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在夏威夷的文教、经贸势力已超过英国。1876年美国诱使夏威夷国王嘉拉高订立互惠条约（Reciprocity Treaty），使美国获得使用港口、租借土地、免税输入商品的特权。唯嘉拉高国王仍力图内政独立，曾喊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Hawaii for Hawaiian）口号。<sup>②</sup>虽然如此，美国的势力以及亲美的势力仍然日渐增高。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嘉美哈美哈三世时，夏威夷即有归属美国之议。如前所述，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亲美派人士即要求与美国合并，并成立了美式的共和国。到1898年8月12日，夏威夷正式与美国合并，1900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夏威夷列为美国的特区，并任命杜尔为总督。此总督的职位，到1903年易为卡特（George R. Carter），1907年易为弗来尔（Walter F. Frear），1913年易为宾可汉（Lucius E. Pinkham）。此后直到1959年改为美国的一州为止，夏威夷虽由美国派总督管辖，但设

<sup>①</sup> Nancy Webb and Jean Francis Webb, *The Hawaiian Islands: From Monarchy to Democracy* (New York, 1958), pp. 27—143, 249; 吴尚鹰：《美国华侨百年纪实》（旧金山，1954年），第439—440页。

<sup>②</sup> 迟景德：《国父少年时代与檀岛环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1976年11月出版），第411页。